

团结战斗的群体

复旦大学“金日成班”班史

复旦大学四九级农艺系编写组

2002年5月

书名题写 金冲及

解放初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学生会主席、团委书
记。后历任复旦大学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
辑、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
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
学会会长，复旦、清华、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二十世
纪中国的崛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

序言作者 郑兰荪

安徽省桐城市人，1927年12月出生。1946年9月考入
复旦大学政治系。1950年4月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1951
年1月抗美援朝运动中入伍。1992年1月离休，离休前任北
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兵团级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序

青年学子的一代楷模

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为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49 级（金日成班）班史作序。

我虽然不是农艺系学生，但对农艺系“金日成班”却有着难以忘怀的特殊感情。这种感情，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熊熊烈火中铸成的。当时我任上海市学联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中。当我得知我的校友们——复旦农艺系 53 届定名为“金日成班”、全班 39 名同学几近百分之百响应党中央号召报名参干时，我的热血沸腾了，我以复旦有这样先进的班集体而自豪！上海市委对“金日成班”的出现非常重视，派专人到复旦进行调查，通过各种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使许多学校的同学受到感染，加速了他们的思想转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日成班”在上海百万青年学生参军参干的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金日成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历史每当进入剧烈变动或转折关头，往往最能考验人也最能锻炼人。有如大浪淘沙，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很快被淘汰出局；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义无反顾地破浪前

进，在滚滚洪流中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飞快地成长起来。“金日成班”正是这种优秀青年的代表。他们是1949年开国以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在旧社会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之苦。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建国后考上大学，一心一意学好专业，满怀信心地准备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而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党中央紧急号召知识青年参军参干，需要同学们在人生道路上急转轨的严峻时刻，何去何从，就成了关系到每个人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金日成班”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而有效地解决了诸如生与死、苦与乐、学业与事业、以及家庭婚姻恋爱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摆对了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而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世界观的转变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在我的心目中，这个班经过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洗礼，已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班级，而是一个具有革命凝聚力的战斗集体；这个班的同学，也已不是一般的青年学生，而是胸怀崇高理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坚定的革命战士，是历史大转变时期青年学子的一代楷模。这是“金日成班”的骄傲。是复旦人的骄傲，也是一代青年学生的骄傲！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白

发苍苍的老人。“金日成班”的同志们各人的经历和际遇有所不同，但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变，振兴中华的鸿鹄之志没有变，忘我献身的精神没有变，殚精竭虑振兴农业的决心没有变，不仅没有变，而且在长期实践斗争中继续升华。几十年来，他们绝大多数人奋斗在农业战线，做出了优异成绩和卓越贡献。涌现出许多一流的学者、专家、科学家，一流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和领导干部。他们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郑兰荪

2002年1月2日

光緒

參加金日成班

盛會感懷

金秋摯友
聚東郊
日月輪回
半世清象
志成城援
朝勇班名
赫一代驕

鴻儒踏遍天
涯路廣援
農科傳絕
招十二億人
衣食足
是黃果幻夢
鄒

庚子年
秋九月
鄭蘭荪敬書



目 录

第一章	复旦大学农学院及农艺系 49 级同学的历史沿革	1—4 页
第二章	在复旦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5—10 页
第三章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11—25 页
第四章	初进农业科学殿堂	26—30 页
第五章	初识农村、农民	31—33 页
第六章	“思想改造”	34—35 页
第七章	迁校，建校，到北大荒去	36—42 页
第八章	生产实习	43—45 页
第九章	毕业，服从分配	46—47 页
第十章	结语	48 页
后 记		49—50 页
附录一	个人简历	51—118 页
附录二	战斗的足迹	119—136 页

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49 级（金日成班）班史

第 一 章

复旦大学农学院及农艺系 49 级的历史沿革

复旦大学农学院成立于 1940 年。它是在 1938 年复旦大学因抗战内迁重庆北碚时在垦殖专修科、园艺系和茶业专修科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有农场 200 多亩，供实习和作物栽培用，此外还有酱油制造室及果园产品加工室，但图书、仪器和设备方面非常简单。1942 年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垦殖和茶业组合并为农艺系，下分农垦及茶业两组。1944 年复旦大学农学院已设立三个系，即农艺系、园艺系及茶业专修科。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迁返上海，1949 年又增设农业化学系。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5 月 28 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复旦大学，5 月 29 日全校师生即返回江湾开展复校工作。解放初，人民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非常

重视农业教育，拨给农学院建设资金。后来建立了农学院实习农场，内有新式加工厂、牛奶房、机械农具室、种子室和温室等。解放前农学院全院同学只有 80 余人，解放后几乎增加了三倍，特别是在科研仪器设备及教学条件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农艺系（农垦、茶业两组）从 1940 年到 1949 年共毕业学生 199 名，1950 年至 1952 年毕业学生 59 名。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7 月，上海市在军管会领导下组织了解放后第一次华东地区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统一招生，并于 9 月 3 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首批笔试试取名单。农艺系 49 级正取 43 名，备取 12 名，其中除少部分去浙江大学农学院就读外，来复旦农艺系报到的只有正取 9 名，备取 7 名。这说明那时的年青人对农业科学认识不够，立志为国家农业振兴而献身的就更少了。开学时来报到的为：洪浩、张国梁、周峨南、顾慰连、甘文龙、蒋寿南、杨宝英、姚少梅、朱鑫泉、潘启新、阙更生、林仲凡、史九成、金少青、刘魁梧、朱永年、金祖恩、吴能、洪绂曾、徐绳祖、郑强仕、周世琦、谢道宏、缪龙生、许士升、罗荣翔 26 名同学。此外高鈺、窦履震由 48 级转来，谢国栋（谢群）、王绍岱从暨南大学转入复旦大学农艺系。农艺系 49 级开学上课时实有同学 30 名。据复旦大学农学院 1950 年 6 月出版的农学院师生通讯录记载，至 1950 年 6 月，农艺系 49 级同学为 29 人（因缪龙生已改读他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院教职员工的关怀培育下，这个班的同学们在实践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不断锻炼成长，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农艺系 49 级成为团结、进步、奋发、进取的一个先进集体，在农学院各项政治运动中走在最前面。

1950 年 9 月从园艺系转来 4 名（王洪熹、吴其杰、袁希绍、潘建楠），其他院系转入 9 名（张文宏、吕超海、邢祖颐、马贻芬、邹旭梅、陈豹略、薛景珉、杨振玉、徐式民），转农业化学系的 1 名（罗荣翔），转外文系的 1 名（高鈺），而洪浩则在入学还不满一年时就因病辍学，后亡故，所以 49 级同学那时为 39 名。

1950 年下半年，农艺系 49 级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经同学们讨论一致同意定名为“金日成班”。全班同学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报名参加军事干校，被正式批准的共 12 名，至此农艺系 49 级同学留校的尚有 27 名。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茶专并入安徽农学院外，全部搬迁至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并作为主体成立了沈阳农学院（现为沈阳农业大学）。在此之前，农艺系 49 级的吴能、薛景珉转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窦履震已休学；因沈阳农学院设立植物保护系，原复旦农学院农艺系的病虫害组按专业自然归并成植保系，而将农艺系更名为农学系。原复旦农学院农艺系 49 级的同学至 1953 年于沈农农学系 53 届毕业的尚有 20

名，由植保系 53 届毕业的则有 4 名，共 24 名。这是解放后入学的第一届农业本科毕业生，大部份同学分配在东北地区各省市，是祖国农业战线上一批政治觉悟高，农业科学知识全面，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 20 年左右的坎坷和折磨，他们仍无怨无悔，凭着立志振兴祖国农业的理想，在农业战线上做出了平凡而又可贵的贡献。他们中袁希绍、顾慰连两位同学已先后去世，参加军事干校的 12 名同学，也都在解放军各军兵种建功立业。杨振玉、陈豹略（赤农）、姚少梅、吕超海、潘建楠五位同学，从部队转业后又继续入学深造，后来都成为事业有成的专业技术人才。复旦大学根据教育部（84）教学字 31 号文件精神，还给他们颁发了准予 1953 年 9 月农艺系本科毕业的证书。参干同学中有两位（郑强仕和许士升）已先后去世。

第二章

在复旦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第一节 上海解放初的形势

1949、1950年，上海解放不久，解放军正在南下乘胜追击。国民党虽然溃不成军，但还在苟延残喘，千方百计安排残余力量作困兽斗。同学们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的。那时一方面上海刚刚获得新生，劳动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来了当家作主的好日子，要用无比高涨的劳动热情来建设新中国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而另一方面，刚解放的上海又是个烂摊子，虽然有些工业基础，但在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发展畸形，譬如工业用的原材料如钢铁、棉花、木材、石油、煤炭等等无不需要外地乃至依赖国外供应，甚至全市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有百分之五十需要依靠洋米洋面。当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全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要一下子百废俱兴又谈何容易。国民党为了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压垮上海，妄图改变其覆灭的命运，不惜动用其最后的海空力量，一方面从海上封锁上海，一方面则凶残地对上海进行疯狂轰炸。继闸北电厂被炸之后，1950年2月6日又炸毁杨树浦发电厂的部分设备，致使上海的不少地区停电断水，全市大部分工厂

停产。国民党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扼杀正在复苏中的上海经济，扰乱人心。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还不断制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刚从山沟里钻出来，对管理城市一窍不通，不懂经济，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共产党蹲不了三个月就要垮台”等等。此时残留在上海的反动势力和不法投机商人也乘机兴风作浪。先有银元贩子跳出来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市场。对此上海市军管会及时予以打击和取缔。继而有投机商人用心险恶地囤积粮食，哄抬米价，他们断定共产党将无粮可以供应。当时政府做了周密布置，从东北急运来的大米都存放在上海四周近郊，在奸商们得意忘形之际，政府大量抛售大米，平价供应市民，一下子就把这些奸诈的投机商搞得折尽老本，再也兴不起风浪来。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战线上一开始打的两个漂亮仗。陈云同志于1949年8月8日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华北、东北、华中、西北五个地区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参加的财经会议，他在会上重点分析了上海的财经困难有：敌人封锁、粮食问题、工厂搬家问题、棉花问题、运输问题、工业生产和金融等问题，并作了实事求是的预测和制订相应对策。会上还讨论了在全国发行折实公债，依靠全国人民克服暂时困难。在国内外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现实的激烈斗争中，复旦大学这座革命大熔炉培育的新一代青年学生，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呢？全校师生在市军管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成为

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在反封锁、反轰炸、护校、粉碎资本家投机、稳定物价等斗争中事事争先。

随着形势发展，同学们的觉悟也在日益提高，学校当时以时事政治学习、对敌斗争与正课学习并重，把专业知识理论学习作为粉碎敌人破坏的实际行动，时刻准备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第二节 在复旦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一、农艺系 49 级同学入校后就在校务委员会和院系领导及地下党的组织下，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1949 年 12 月复旦大学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复旦支会，同学们全部参加；1950 年 1 月全校发动认购折实公债，同学们积极响应，至 5 月全校认购超过 12 万份，为上海大专院校最高纪录。1950 年 2 月美制蒋机轰炸了杨树浦发电厂。为了反轰炸，加强防空护校工作，学校成立护校委员会，下设防护团，有纠察、救护、消防及直属通讯等四个组，全班同学分别参加了小组活动，日夜守护在校园里。5 月庆祝解放后第一个校庆，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政治克服困难，上好业务课来庆祝自己的节日。7 月展开和平签名宣传活动，同时组织同学们赴上海棉场暑期实习。8 月 1 日庆祝建军节，同学们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示威游行。10 月 1 日同学们又参加了全市庆祝开国一周年的辉煌胜利和保卫世界和平迎接新的斗争示威大游行。10 月 5 日

带着七千万青年兄弟的友谊，世界青年代表团来校访问，同学们参与了盛大的欢迎会，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1月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同学们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祖国。通过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教育和启发，同学们对新中国更加热爱，更加坚定了对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志愿军的拥护和革命胜利的信心，树立和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不少同学先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二、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同学们不忘理论联系实际，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经系领导安排，利用入校后的第一个暑假，于7月17日起组织同学们赴上海棉场实习。这次实习是对棉麻耕作的全过程即从选种开始到施肥、授粉、农药的调制和病虫害防治等栽培管理技术进行操作实习。在烈日当空的棉田里，同学们学习授粉、整枝。当麻杆浸泡在水中需要剥制时，同学们纷纷跳入沤麻的污水中把麻杆捞上来。实习的目的是建立劳动观点，从劳动中学习田间耕作和管理的实际经验。大家的劳动热情博得棉场领导和职工们的好评。8月26日棉场工会成立，同学们带着文艺节目前去祝贺，与职工联欢。

在农场实习的鼓舞下，为了加强农业实践并响应政府关于“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号召，同学们在搬入“德庄”宿舍后不久，在史九成、阙更生的倡议和谢国栋、吴能、

潘启新等的积极参与下，并在集聚到少量资金后就去江湾镇购买农具、菜种和搭瓜架用的竹竿等物品。他们带动全班同学把宿舍南面的一块杂草丛生、瓦砾遍地的荒地，改造装扮成水池垂柳、嫩苗绿圃的实验园地。在劳动中史九成、阙更生不仅能够筹划好、部署好，并且处处带头，以身作则。全班同学不顾泥浆沾满全身，光着脚开挖三尺深的排水沟，把臭气冲鼻的垃圾和污泥清理干净，作田畦、播种、施肥。在这块园地里同学们先后种了十五种蔬菜。丰收时节，无偿给学生食堂提供一些花色蔬菜。当品尝到自己亲手种植的新鲜蔬菜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三、49级同学还参加了《上海青年报》复旦大学发行组工作。1950年9月《上海青年报》复旦大学发行组在校团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成立，当时农艺系49级谢国栋和部分同学负责组织发行组的工作。全校每个系派一名团员参加，包括吸收订户、上门收费、向报社预订、及时取报和分发到人。逢有特大新闻或号外，整个发行组全部出动定点销售。每当“登辉堂”（即现今“相辉堂”）举行大会时，为配合时事形势教育，发行组在会场外设点销售，将喜讯或胜利的消息及时传遍全校。这是同学们义务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种好形式。同学们认为能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下做些有意义的事感到无上光荣。

第三节 “一边倒”的教育与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派了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使同学们开始了解苏联对我们的真诚同情、援助与友谊，看到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及其他各国人民对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颂扬和欢呼，初步认识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同学们更明确了“一边倒”的理念和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的意义。从实践中体会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哲理。1949年12月20日复旦大学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复旦支会时，同学们全都参加了。当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在社会上公开发表时，同学们都自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通过专业课学习，同学们也体会到苏联的科学研究注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要把生物科学和农学方面的成就很快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这为同学们以后重视生产实际，不尚空谈，学好农业科学知识，从事农业科学试验，搞好育种、栽培，在思想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